



# 訪錢存訓教授談中國書籍史之研究及治學方法

Interview of Professor T. H. Tsien on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and Research Methods

張寶三 (Chang Pao-san) \*

錢存訓教授，1910年出生於江蘇省泰縣，南京金陵大學文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博士。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圖書館代理館長，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國立北平圖書館南京及上海辦事處主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及圖書館學研究院教授、東亞圖書館館長，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榮譽教授、東亞圖書館榮譽館長，英國李約瑟東亞科技史研究所終身研究員。著有中、英、日、韓文本《書於竹帛》、《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造紙與印刷》，中文本《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中美書緣》，英文本《中國書目解題匯編》、《古代中國論文集》、《區域研究與圖書館》等專著及論文百餘篇，為騰聲國際之著名學者。筆者於2002年夏季，受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之邀，至芝加哥大學作為期一年之訪問研究，因得以拜謁錢教授。深覺錢教授之學行及治學經驗甚可供學界參考，爰徵得錢教授同意，以有關中國書籍史之研究及治



學方法為題進行訪問。訪問於2002年11月7日至2003年1月9日之間，共進行多次會談。地點為芝加哥市海德園區錢教授住宅。為方便讀者瞭解，文中所提及之部分內容，筆者特略作註解，以便參照。

## 一、在國內求學及工作的情形

問：先生來美國之前，已在中國國內完成了大學學業，並且有一段工作經驗。首先能否請先生談一談在國內求學及工作的情形？

答：我最初是在家塾啟蒙，後進入泰縣第二高等小學肄業。1926年畢業於淮東中學（現泰州中學）。1928年進入南京金陵大學就讀，同時在金陵女子大學圖書館工作，這可說是我與圖書館事業結緣的開始。<sup>1</sup>當時金女大的吳貽芳校長特別允許我在該校選課，我曾選讀了繆鳳林先生的「中國通史」和曾虛白先生的「翻譯學」。在曾先生課堂上的作業，翻譯了羅梭（Bertrand Russel）〈東西快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有關錢存訓教授之家世及經歷等，參見鄭炯文著〈坐擁書城五十年——記錢存訓先生的生平與事業〉一文（英文稿原刊*Bulletin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o.81, 1987；中文稿收入錢存訓教授著《中美書緣》附錄，臺北：文華圖書館資訊公司，1998年）。另錢教授著有〈留美雜憶〉（中文稿本），對其生平及留美生活所述較詳。



樂觀念之歧異〉以及歐策德 (Dorothy J. Orchard) 〈中國以抵制外貨為對外武器〉，這兩篇譯作曾先後發表在當時風行的刊物，<sup>2</sup> 成為我譯作的開端。

我在金陵大學主修歷史，副修圖書館學。曾修習貝德士 (Dr. M.S. Bates) 先生所授的「歐洲史」、「俄國史」、「印度史」和「日本史」，劉繼宣先生的「中日交通史」，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百年史」；除必修的國文、英文、數理化等課程外，我也曾選讀胡光燾 (小石) 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劉崇本先生的「政治學」，吳景超和史密斯 (Dr. Louis S. C. Smythe) 先生的「社會學」、「人口學」、「社會調查」，劉國鈞先生的「中國書史」，李小緣和陳長偉先生的「圖書館學」等課程。圖書和歷史兩者的結合，對我一生的事業和研究興趣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我能終日與圖書為伍以及在芝加哥大學寫作碩士與博士論文，也都和在大學所選修的課程有關。

1932 年大學畢業後，我由校方推薦到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擔任副館長，在館長杜定友先生指導下，增加了一些圖書管理和技術方面的經驗。五年後，我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之聘，改就北圖南京工程參考圖書館主任。此館是北平圖書館因戰事南遷所設的分館之一，地址設在新建的地質調查所大樓內，主要收藏由北平南遷的西文及日文全套科技學術期刊以及有關工程的重要參考書約四千餘冊，另有內閣大庫舊藏輿圖七千餘種。但是當我到館後沒有幾天就發生了蘆溝橋七七事變，不久戰火延燒到華中，北平總館南遷長沙，再遷到昆明，南京分館也奉命疏散，我被改派到上海辦事處工作。那時上海分館設在法租界的中國科學社內，由北平遷來的全套西文學及東方學期刊約一萬多冊存放在那裡。另有善本古籍約五千多種，六萬餘冊，以及敦煌寫經九千多卷和金石碑帖數百件，則存放在公共租界的倉

庫內。當時上海的工作除了保管善本圖書外，還協助編印中英文本《圖書季刊》、搜集抗戰史料以及對國外圖書館的聯繫。

不久，上海租界內的安全也漸無保障，於是當時駐美大使胡適之先生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商定，將存放在上海的這批善本移存該館保管，並攝製微卷以供流傳。雖然雙方已商議成功，但上海海關在日軍的監管下無法運出。最後由於偶然的機緣，由我和海關外勤人員秘密商定，將善本圖書偽裝為代國會圖書館採購的新書，分批交由商船運出，經過兩個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抗戰勝利之後，我受教育部委派擬赴華盛頓將這批圖書接運回國，但因國內戰事爆發，未能如願。<sup>3</sup> 卻由館中推薦來到了芝加哥，至今寄居此地，不覺已超過半個世紀，回首當年往事，不禁感慨繫之。

## 二、在芝加哥大學工作與進修的過程

問：先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來到芝加哥大學的？

答：我是在 1947 年秋季以北平圖書館交換館員的身分受邀來到芝加哥大學。主要的任務是負責整編遠東圖書館自 1936 年以來所購置積存的中文古籍，同時在圖書館學研究院進修。但工作一年後，邀請我來芝大的顧立雅 (Herrlee G. Creel) 教授要我延期居留並在東方語文系兼課，而且願意協助我接眷來美。經北圖同意後，芝加哥大學自 1949 年起聘任我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銜講師 (Professorial Lecturer)<sup>4</sup> 兼任遠東圖書館館長。不久，我的家眷來到芝加哥相聚，這是我和我的家人在經過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後，得以安居樂業、埋頭苦讀而最清靜的一段時期，感到十分幸運。

問：先生在芝加哥大學進修的過程如何？

答：我最初來美的計畫是大部分時間在遠東圖書館

2 〈東西快樂觀念之歧異〉譯文刊於《世界雜誌》第 2 卷第 4 期，1934 年 10 月。〈中國以抵制外貨為對外武器〉譯文刊於《時事月報》第 5 卷第 2 期，1931 年 8 月。參見潘銘燊編〈錢存訓教授著述目錄〉（原刊錢存訓先生八十榮慶紀念《中國圖書文史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 年；增訂本另收入《中美書緣》附錄）。

3 此批圖書於 1966 年運臺寄存，現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保管。有關此批圖書運美及遷臺經過，詳見錢教授著〈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運美經過（附記遷臺經過）〉（收入《中美書緣》）及〈北京圖書館善本古籍流浪六十年——祝願國寶早日完璧歸趙〉（臺北：《傳記文學》第 79 卷第 6 期，2001 年 12 月）二文。

4 此乃因當時必須具有教授職銜方能獲得在美永久居留權，然錢教授尚未取得博士學位，僅能擔任講師，故校方以「教授銜講師」聘任，以便錢教授可以順利留校，其原委見〈留美雜憶〉。



工作，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學研究院選課進修。芝大採學季制，每年四季，每季應選三門課，我因全工半讀，每學季只能選讀一門，連同暑季，每年可選讀四門。因此，前後共花了五年時間，於1952年秋季取得碩士學位。在完成碩士學位之後，本已覺得精疲力竭，實在不想再上層樓。但是由於在校學業成績不差，受到許多教授的鼓勵，同時多年來學費全免，沒有經濟上的負擔，終於決定繼續深造。再經過五年時間，於1957年夏季取得博士學位。總計在芝大進修，前後共計十年。如今回想，若非當年顧立雅教授的善意安排，以及我妻文錦和家人的全力支援，實在很難想像如何度過每天工讀將近十六小時的日子。而這一苦幹作風，竟已成為我的生活習慣。至今每天必須伏案研讀或面對電腦寫作，否則便覺得枉費時日，難以安心。

問：能否請先生談一談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院修業時對您較有影響的幾位教授？

答：我對圖書館學發生興趣，主要是在大學讀書時，曾一面在圖書館工作，另外也深受劉國鈞先生所授「中國書史」一課的啟發；因此，到芝加哥大學後，即決定主修圖書印刷史。芝大最初講授印刷史的教授是卜特勒（Pierce Butler）先生，他所著的《印刷術的起源》一書是西方印刷史的權威之作，可惜在我到校一年後，他就退休了，因此我選讀的碩士課程主要是由其他教授所講授。其中有賈瑟·希拉（Jesse H. Sherra）講授的「圖書分類的理論與實踐」，卡勞夫司基（Leon Carnovsky）講授的「圖書館調查法」，佛斯勒（Herman H. Fussler）講授的「大學與研究圖書館」，以及艾西漢（Lester E. Asheim）講授的「讀物研究」、「大眾傳播」和「內容分析」等課程。那時圖書館學的重點正值由人文學科轉移到社會科學的時代，因此新設有關這一類的課程，對我寫作碩士論文「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有很大的影響。

在我開始修讀博士課程時，專治西洋圖書印刷史的文格（Howard W. Winger）教授於1953年受聘來校，主講西洋「圖書館史」、「書史」和「印刷史」，因此成為我的導師。他的學養和風度對我的治學、研究以及行事為人都有很大的幫助。此外，我的博士研習是圖書館學和東亞語文的雙重專業，因此我也曾選修顧立雅教授所開設的教研班，<sup>5</sup>以《戰國策》為題，寫作論文。<sup>6</sup>後來我寫作博士論文「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便是在他們二人的指導下所完成。

### 三、在芝加哥大學工作及教學的經驗

問：先生曾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多年，能否請您談一談這方面的工作經驗？

答：遠東圖書館最初設在東方學院的地下室，1958年遷移哈普圖書館二樓，增設日文部，稍後亦購藏韓文資料。1970年再遷到新建成的約瑟·雷根斯坦圖書館大樓，新址地方寬敞，設備完善，是美國收藏中文圖書最多的大館之一，也是中西部收藏最富的一處東亞研究資料中心。<sup>7</sup>現今東亞圖書館收藏已達五十萬冊，各類齊備，所藏善本有元、明刊本、稿本等五百多種，一萬五千餘冊；清初迄乾隆刻本約五百種，七千餘冊。其他精品有漢代封泥、唐人寫經、五代印本《陀羅尼經》、明刊清修《大藏經》六千餘卷，另有自日本內閣文庫影印的明刊方志及善本五百餘種及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微卷一千餘卷。總計館中特藏以經部數量最多，其中不乏孤本與珍本。如明萬曆刊本《尚書揆一》、明崇禎刊本《尚書集解》、清初刊本《四禮初稿》等，皆屬稀品。另有《沅湘耆舊詩集續編》及文廷式《知過軒隨錄》等，皆為未刊稿本。

自從二次大戰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後，美國的中國研究範圍已從傳統的語文、歷史擴充到現代的政

5 「教研班」即指 seminar 課程，由教授與學生選擇專題討論，深入研究，寫作論文。

6 此篇論文，後收入英國魯惟一（Michael Loewe）所編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Study*（Berkeley, CA, 1993）。此書有李學勤等編譯之中文譯本，名為《中國古代典籍導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7 有關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成立及發展過程，可參見 T. H. Tsien,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5, No. 3 (May, 1956); David T. Thackery,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6-1978" (Thesis [M.A.],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June 1983)。



治、社會、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部門；因此，從 1958 年起，遠東圖書館獲得聯邦政府、福特基金會及芝大的特別補助，所購新書除補充古典著作外，也大批採購全套期刊、公報以及自 1920 年代以來所出版的社會科學及新文學作品。雖然在 50 年代，受到韓戰及麥卡錫主義的影響，購買中國圖書曾遭遇到不少限制和波折，但仍然努力克服各種困難，搜求未輟。今日芝大東亞圖書館所藏的現代出版資料，其選擇不僅無特殊的政治背景，更無地域之分，因此有許多重要研究資料，都兼收齊備，很多為中國大陸或臺灣所未存。這是芝大東亞館收藏的原則，也是國外中文圖書館收藏的特色。

問：能否請先生談一談您的教學經驗？

答：我從 1949 年起在東方語言文學系兼課，講授「中國目錄學」和「中國史學方法」。這兩門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訓練研究生如何搜集資料撰寫論文，因此第一學季的「中國目錄學」，我即採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結合中國目錄學的內容，編成一套講義，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十個專題，每周講授一個專題。第一部分為「通論」，包括定義、範圍及功用，圖書印刷史、版本學名詞及術語等，使學生對圖書本身的歷史和圖書資源的基本知識有一瞭解。第二部分為「研究方法」，包括採訪、分類、編目、檢字法、寫作格式、資料組織等，從圖書館作業到搜集資料及論文寫作的實際過程加以介紹。第三部分為「參考工具書」，包括各類目錄、書報索引、字典辭書、叢書類書等主要參考資料，以增進學生對一般工具書的知識和使用能力。除了課堂上的討論外，每部分都有指定作業，作為練習。第二學季則專門講授「中國史學方法」，因為東方語文系的研究生寫作論文，主要為文史專業，因此這門課的內容著重在檢討史部資料以及對傳統史部的重要著作及主要參考工具書等加以系統的介紹。這兩門課實際上是作為漢學研究方法的入門，學生修習之後，在寫作論文時，從選擇題目、搜集資料、到計劃大綱、擬定子目，寫作格式、編排參考書目等都有所幫助。從 1958 年起，遠東系即規定這兩門課為博士班的必修課程。因此，博士生的論文前期作業大都是從這兩門課程的練習中所形成。另外，

我曾在圖書館學研究院開設過「中國印刷史」的教研班三次，一方面將我寫作《造紙與印刷》所搜集的資料與研究生分享，一方面也訓練了一批對此專題從事高深研究的青年學者。這是美國大學中唯一開設過這一專題的課程。

東方語言文學系於 1958 年起，分為遠東（後改名為東亞）、近東及南亞三系，另外成立跨院系的遠東（現名東亞）研究中心。我在 1958 年升任為遠東系副教授，1962 年升任為東亞語言文明學系和圖書館學研究院的正教授，以一半時間從事教學與研究，另一半時間則兼管圖書館的業務，直至 1978 年退休。因為校中仍為我保留一間辦公室，許多研究工作是在退休後才能專心寫作，實際上可以說是退而未休。

### 四、研究與著述

問：先生在工作、教學之外，同時也重視研究，著作不輟，深受學界推重。能否請先生先談一談《書於竹帛》這部書寫作及出版的情形？

答：《書於竹帛》這部書原以英文寫成，書名為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62 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底稿是我的博士論文，對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籍和其他文字記錄的載體和工具作一系統的研究，提供中國古代文化傳播與繼承的資訊，使西方學者在研究世界圖書發展史時，對中國文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增加瞭解。在論文完成後，曾加修訂，改題《書於竹帛》，經圖書館學研究院推薦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當時西方的中國研究還是冷門，對這一主題偏僻的著作，出版社認為銷路有限。不意出版後三個月內，第一版就已售罄，接連於 1963 及 1969 年二次續印。受到國際學術界的一致好評，<sup>8</sup>認為是卡特（Thomas Carter）《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經典著作的姊妹篇，並由各大學採用為指定參考書。最近我已將英文版的內容重新修改，由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教授寫作長序，不久將出版增訂本。

8 參見別立謙，《論錢存訓對中國書史研究的貢獻》（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1998 年 6 月）；論文作者另撰有「評介摘要」約 30 種，收入《書於竹帛》第四次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附錄四。



此書的中文譯本，最早於 1975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題名為《中國古代書史》。後來又有幾次增訂，書名也有改易。<sup>9</sup> 另外，此書曾由日本及韓國學者分別譯為日文及韓文。<sup>10</sup> 回顧這部書從 1962 年出版以來，到今天不覺已經過四十年，其間陸續增訂、流傳廣遠，實在是始料所未及。就如同平岡武夫教授在日文版的序言中所說，此書「可以說是一部由殷墟到敦煌這重要時代整個漢字書寫的歷史。……是以重新觀察漢字文化為出發點的著作。……這是一部持續成長、幸運的書，也可說是蘊含著生命的書。」<sup>11</sup>

問：先生另外也著有《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造紙與印刷》、《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中美書緣》等書，能否請您談一談這幾部書的寫作情形？

答：我的《書於竹帛》下限斷代為西元 700 年前後印刷術發明的初唐時期，出版後曾打算寫作續編。正好 1967 年接到英國李約瑟博士的邀請為他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大系中第 5 卷第 1 冊中有關「紙和印刷」一章的寫作，可謂不謀而合。因他已屆退休年齡，希望有生之年能和他人合作，完成他的《中國科技史》巨著。因此，我接受他的邀請於 1968 年秋間訪問劍橋，商談寫作計劃。同時並訪問英倫及歐洲各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開始收集資料，以供參考。此後又遍訪其他各地，資料愈集愈多，內容愈拓愈廣，結果從草擬大綱到全書完成，前後花了十五年的時間，而篇幅也從預訂的一百頁擴充成為三十萬言的一本專冊，實非初料所及。

此冊共寫成十章，其中造紙、印刷（包括製墨和裝訂）及傳播各三章，另緒論一章，除全書提要及介紹有關資料外，並討論為什麼這二大發明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不是西方？最後一章並論二者的功能和影響作為結論。我特別指出印刷術在中國和西方的功能雖然相似，但其影響則並不相同。這一結論和他人意見不同，但受到李氏的贊賞，認為可提供他在全書結論中的一些思考。

這一冊的寫作是在公餘之暇，斷斷續續，多年未能完卷，直到退休後才能專心於此。因獲得美國科學基金會和美國人文科學基金會的獎助，得以聘請研究助理相助編訂。於是又花了兩年時間，終於將初稿十章完成。再加搜集圖約二百幅，編製參考書目約二千條，全書在 1982 年中全部殺青，9 月再訪劍橋，將書稿面交李氏作一結束。最後再經過編輯、排印、校對等技術性加工，全書終於 1985 年作為《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分冊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冊定價六十六英鎊合美元一百元，相當高昂，但初版一千五百冊在發行前就已預訂一空，二次印刷不久又告售罄；因此我又將初版中的排印錯誤加以修訂，1987 年再重印第三版，成為李氏大系中最暢銷的一冊。李博士對這一冊合作的成功，表示非常滿意，因此特別來信，謂經董事會通過，聘請我為他所創辦的東亞科技史研究所的「終身研究員」（Research Fellow *en permanence*），這是對我的一項特殊榮譽，因此欣然接受。同時此書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認為這是一冊對紙和印刷術的權威之作，也是有關這一專題的一部百科全書。

不久，北京中國科學院首選此冊請劉祖慰教授譯成中文，題名《紙和印刷》，199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科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作為贈送李約瑟博士九十歲生日的一份壽禮。稍後，臺灣《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編譯委員會亦由劉拓及汪劉次昕父女另譯，題名《造紙與印刷》，1995 年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另有譯本一種為北京外語大學夏祖奎教授在此書出版前根據原稿所譯，因我無暇校閱，至今未能出版；現正由北大鄭如斯教授修訂，將題名《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另有日文譯本，由澤谷昭次及佐藤武敏兩位教授合譯，將收入日譯本《中國の科學と文明》大系中。又年前有韓國全南大學宋日基教授請求許可韓譯，但至今尚未出版。

9 如 1986 年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的簡體字本，書名採用論文原題《印刷術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1996 年臺北漢美圖書公司出版的繁體字增訂本，書名改用英文本原題《書於竹帛：中國古代書史》；2002 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的第四次增訂本，書名定為《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

10 日文譯本題為《中國古代書籍史——竹帛に書す》，宇都木章、澤谷昭次、竹之內信子、廣瀨洋子合譯，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出版，1980 年。韓文譯本題為《中國古代書史》，金允子譯，漢城：東文選，1990 年初版，1999 年再版。

11 見《中國古代書籍史——竹帛に書す》，頁 10，平岡武夫序。



《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一書於 1992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共收錄有關專題論文十六篇，附錄「中國印刷史簡目」及題跋、評介等十篇。此書所收的論文，大部分是我寫作《書於竹帛》和《造紙與印刷》二書的副產品。因為專書限於篇幅和體例，對一些細節不便詳細討論，但對某些問題則必須探明原委，才能作出結論，因此必須先作專題研究，再把重點在專書中摘要敘述。例如有關「書刀」的研究，在《書於竹帛》中只有兩頁，但在論文集集中所收的〈漢代書刀考〉則長達一萬言。<sup>12</sup> 此書最近經過增訂，改題《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分上下二編，收錄論文及雜文各二十篇，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於 2002 年底出版。

至於《中美書緣》一書，於 1998 年由臺北文華圖書館資訊公司出版，收錄有關中美及東西文化交流的論文、報告和雜著等共十二篇，附錄四篇。此書的內容大致包含有關「東西文化交流」的記述，尤其是對中美兩國間早期及近年交往的記錄和分析；「歐美書藏概況」對西方所藏中國語文資料加以有系統的介紹；以及「中外人物懷念」對多年來在國內外所交往的幾位師友的懷舊與記念。整體來說，此書所收錄的大都環繞我寫作的另一主題：中西文化關係，其中不只是一些史實的記錄和報導，也包含了一些個人的經歷和觀感。另有和他人合編的專書兩種：《古代中國論文集》收入有關先秦及漢代思想與制度的論文十二篇，為紀念顧立雅教授七十歲生日而編集；《區域研究與圖書館》是討論東亞、南亞、東南亞、近東、非洲、拉丁美洲、蘇聯及東歐等地區研究與圖書館問題的論文集，為 1965 年圖書館學研討會的會議記錄。<sup>13</sup>

## 五、治學方法與經驗

問：到芝加哥大學來，對您的治學有何影響？

答：在國內時，雖然我也曾經發表過幾篇論文和譯述，但大都是在大學時代的課程作業，談不上真正的研究。到美國芝加哥大學以後，在寫作方面，對選題、搜尋資料和研究方法等都有新的收穫；加上多年來教學的經驗，對於治學和研究，也自覺有一些進步。譬如選題，觀點比較新穎而深入，多找前人所未言，填補空白或小題大做；在參考資料方面，則注重原始和完備；在研究方法上，則從領悟和創新等多方面著手。譬如：我的碩士論文「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是採用計量的方法，在譯書目錄中收集到 16 至 20 世紀的譯書約一萬種，從題材類別、原著來源、譯述數量及出版年代等方面加以分析，反映出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社會所產生的變化。這一方法實受英國學者休謨《統計目錄學》（E. W. Hulme: *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London, 1924）一書的啓示。此書採用統計方法對歐洲的搖籃本<sup>14</sup> 約二萬種的內容加以分析，以見印刷術對西方文明所產生的影響。中國學者對目錄學的觀念，一向注重著錄的內容，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實際是一種內容分析，即從分析書目內容，進而追溯文化的長成，我的論文以計量方法研究中國現代史尚屬首創，因此獲得《遠東季刊》主編的賞識，將摘要在該刊發表，<sup>15</sup> 成為我以英文寫作最早發表的論文之一。

另一篇論文〈中國圖書分類史〉<sup>16</sup> 其中曾論及中西分類思想的異同，是採用所謂比較法的。我在文中提出

<sup>12</sup> 此文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 4 號下冊，臺北，1961 年。收入《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頁 43-56；有英譯本：“A Study of the Book Knives in Han China,” translated by John H. Winkleman, *Chinese Culture*, Vol.21, No.1 (March, 1971), pp. 87-101.

<sup>13</sup>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T. Roy and Tsuen-hsuei Tsie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8; *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ed. By Tsuen-hsuei Tsien and Howard W. Win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sup>14</sup> 「搖籃本」(Incunabula) 指歐洲活字印刷術創始時期所印刷之出版物，尤其指西元 1500 年以前之印本。

<sup>15</sup> 見 T. H.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No.3 (May, 1954), pp. 305-29. 譯文見〈近代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收入《中美書緣》，頁 35-64。

<sup>16</sup> 見 T. H. Tsien, “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Library Quarterly*, Vol. 22, No. 4 (October, 1952) pp. 3-7-24.



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0-1626）的三分法，將人類知識分為哲學、歷史和文學，是西方圖書分類法的基礎，這和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除經部以外完全相同。培根再將哲學分為神道、自然、人類，這和中國思想中的天、地、人三才的說法更為符合。培根的著作中引用中國的發明和事物甚多，因此我認為培根的三分法可能是受到中國分類思想的影響。

另有一篇討論印刷術的論文<sup>17</sup>也是採用比較法的。即印刷術為什麼在中國而非在西方發明？一般學者都認為印刷術發明的技術基礎之一是印章的使用，但是印章在西方文明中的使用早於中國，可能在文字發明以前就盛行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為什麼西方的印章沒有導致印刷術的發明呢？經過詳細比較，說明中西印章不僅材料相同，用途也大致一樣；可是西方的印章主要是圓柱形，在黏土、膠泥、或蠟的平面上滾動而作出印文；埃及的印章雖是平面，但大都是圖案而無文字。而中國的印章多半是正方或長方形、平底、雕刻反體字、在紙上蓋印，有時刻有一百多字。這些特徵就和印刷非常接近，因此成為印刷技術的前驅，就不難加以解釋。

問：在先生治學的經驗中，覺得最應注意的原則及方式為何？

答：我的治學方法，主要是在研究院寫作論文時所累積的一些經驗，因為在寫作之前，必須閱讀大量有關的參考資料，因此，寫作時多少受到這些資料的觀點、方法以及內容的提示和影響。至於以英文寫作的文體，大概是從每日讀報的新聞體裁中所得的一些啟發和領悟。因為新聞報導的文體，一般是簡潔明瞭、文字通俗、敘述清楚，尤其是開頭的主題和摘要，提綱挈領，繼之是詳細的事實說明，最後作出結論或批評，這種三段式的體裁，也是一般寫作論文所採取的方法。因此，無意中學到了字句簡潔、行文流暢、避免重複，使文字的組織有層次、有條理和有系統的寫作習慣。

至於我的寫作內容和體例，有讀者認為：「資料豐

富，結構謹嚴，章與章之間像有機體般的凝成一體。……古籍資料……用自己的文字再表達出來。」<sup>18</sup>我想這一批評雖未免過獎，但是確當的。對於資料，凡與主題有關的著述，我都全部收集，再加選擇，編成參考書目，以供閱讀。關於結構，我通常在寫作之前，對全書的分章、分節、分段都預作通盤的籌劃；初稿寫成後，再對每個章節加以修飾和調整，使各部的長短適中。在每章的前後，也都互相照顧和關聯。至於每章內容，大都根據資料的多寡和性質加以配合。譬如，在寫作《書於竹帛》時，金石文字本應屬於一章，但兩者資料過多而與其他各章的分量不能平衡，因此我將金石分開，金文與陶文結合，石刻加玉辭各成一章。雖然陶泥和青銅的性質不同，放在一起似不合理；但我對二者的淵源和關聯，在章首加以解釋，就不覺得牽強。至於引用古籍，以英文敘述，必須對原文十分瞭解，才能逐字逐句翻譯，再用自己的文字加以敘述。不若以中文寫作，如引用古文，即使不全部明瞭，也可入，因此以外文寫作的難度就大不相同。

總之，我認為治學的原則是獨創園地，避免與他人重複。因此，利用目錄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從選題、擬定大綱、搜集資料、寫作以至編製參考書目，都必須首先檢查目錄，確定前人有無做過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如此可以避免重複，並據以改定主題或調整範圍。在擬定大綱時，目錄可以提供相近的著述，豐富內容。至於搜集資料，更必須依靠各種目錄的幫助，否則就無法求其完備。目錄的利用，首先應該檢查「目錄之目錄」，因為目錄是治學的基礎，研究的指南，對檢查任何有關主題，當然要先求教於目錄的提示，才不致有所偏失。我在編製「中國目錄學」講義時，曾搜集古今中外各種語文有關中國的「目錄之目錄」二千五百餘種，後來將這一部分特別提出，由鄭炯文同學逐一檢閱，寫作提要，編成一部《中國書目解題匯編》，<sup>19</sup>成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必須首先搜索的一部重要參考工具書。

17 見〈中國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早於歐洲的諸因素〉，《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443-52；收入《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增訂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236-49。

18 見李琰，〈中文本《中國古代書史》評介〉，原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卷，1968年；收入《書於竹帛》附錄。

19 此書與鄭炯文合作，以英文撰寫，書名為 *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 Boston: G. K. Hall, 1987。



因此，我的寫作資料能夠比較完備，充分利用目錄，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問：在先生所研究的領域中，您覺得還有那些問題尙待探索？可往何種方向思考問題？

答：我的研究範圍主要環繞兩大主題，即中國文字記錄的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兩者的結合，從高度和比較的觀點出發，所得出的結論便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我曾在《書於竹帛》的緒論中指出中國文字的延續、多產和廣被性是中國文化的基石，也是世界文化史中所獨具的特色；便是根據我的觀察、分析和研究所作出的結論。但是因爲受限於全書的體例，對這幾點僅能摘要說明，未能多所發揮。我想對這一問題，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掘，對每一特點或其他要點作出更詳細的分析、舉例和比較，可有更多的發現。這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希望有志者繼續探索。

對於圖書印刷史的研究，過去中國學者的著述，大致可歸納爲兩大主流，一是傳統的目錄版本學系統，注重圖書的著錄、鑒別、流傳和收藏方面的考訂；另一是現代學者所受西方的影響，對印刷術的起源、發展、傳播和技術等方面的探討。我想將來的研究方向，應該注意對印刷文化史上各種問題的探索，尤其是印刷術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我曾在《造紙與印刷》書中提出這一問題，並比較印刷術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及西方社會中的功能和影響。我的結論是功能雖然相同，但有程度上的差

異；至於對中國和西方不同社會背景中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完全差異，並且背道而馳。在西方，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促進民族語言和文學的發展，鼓勵民族主義和建立新興的民族國家；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印刷術和科學制度相結合，不僅幫助中國文字的連續性和普遍性，更成爲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相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統一的堅固基礎。我的意見和他人不同，但這一問題必須從社會、經濟、政治等各方面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最後的結論。我想這是研究圖書印刷史應該重視的一個新方向。

最後一個問題值得提出的是：人類思維的記錄方式和載體的材料，其間有無一定的關係？我曾在《書於竹帛》的結論中說：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只是增加便利和數量，並沒有改變書籍內容的高度和深度。試想影響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傳統思想，尤其像儒、道、法等各家學說，當時都是書於竹帛上的不朽之作。又如歷代奉爲正史圭臬的《史記》，也是寫在大約五萬枝竹簡上一部重要著述。在紙和印刷術發明以後，似乎並沒有產生超越這些書於竹帛上流傳千古的學說。甚至今日的電腦時代，我們也還沒有看到一部歷史著作，其體例、規模和創見能超出司馬遷所創造的紀傳體所包含的面、線、點而統蓋歷史全面的寫作方法。人類思維的能力和文字載體的方式，其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也是值得我們繼續深思的一個重要課題。